

广东省
省文化
传播学
会主持
编纂
国新文
化传播
书系

跨世纪的沉思(上)

张磊著

中国新文化传播书系

跨世纪的沉思(上)
——历史·文化·人物

张 磊 著

广州出版社

中国新文化传播书系

编 委 会

顾问：张 磊

主编：田 丰 柯 可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张 磊	田 丰
-----	-----

罗尚贤	柯 可
-----	-----

谭元亨	朱剑飞
-----	-----

应向东	徐肖楠
-----	-----

总 序

没有传播的文化是凝固的文化,没有文化的传播是无价值的传播。当新世纪的曙光拂耀在世界文化之林的绿色树梢,那发明了活字印刷传播术的中国文化,在渴望和平发展的亿万人的热切注目下,仿佛正幻化成全球文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崇高人文精神的一道亮丽风景。

穿越风烟弥漫的遥远古代疆场,中国文化向我们蹒跚地走来:由浑浑茫茫、一统天下、包罗万象的总系统开枝散叶,又在百家争鸣中明辨是非,消解歧见,兼容共存,延续了由顺应自然的道家、立法强国的法家、崇仁尚礼的儒家所弘扬的民族文化血脉,在东方大地燃起了世界文明的辉煌……

脚踏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征程,中国文化向我们阔步地走来: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和血火考验中,培育了一个个革命的先行者和无畏的改革家,有赖于他们前赴后继的上下求索,掀起了当前经济文化建设的热潮,在全球文化的视野中沉思远眺,批判剖析,描绘着未来社会的壮丽宏图……

跨过诗意升华的新文艺建设工地,中国文化向我们矫健地走来:敏锐触探大时代的脉搏,精心塑造生动鲜活的形象,高声呼喊亿万民众的赤子之心,愤怒鞭挞丑恶的社会现象,无情抖落腐朽文化的灰尘污秽,创造出了无愧时代、彪炳史册的精美艺术……

批史阅著,治实务虚,若以信息论看,中国文化犹如气象万千、

丰富多彩、无穷无尽的知识海洋；若以系统论看，中国文化则像一株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学科系统的参天巨树；而若以控制论和非线性思维的眼光，站在历史与美学的高度仰望，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是由中华民族健儿齐心托起，喷薄而出，和光同尘，兼容百家，在减熵增序、去旧生新、与时俱进的浩瀚宇宙中，照耀寰球，熠熠生辉的一轮朝阳！

面对中国文化，这热力无穷、光芒四射的人文巨日，这源远流长、浩瀚奇丽的智慧海洋，这集英撷粹、美不胜收的知识园林，我们怎能不鼓励，不争做那无畏的勇者，去拨开那历史的迷雾，去冲破那僵化的陈说，去探寻那理想的奇葩呢？

我们不强求本书系人人立论稳妥周全，更不奢望个个阐述得尽善尽美，但力求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传播新知。我们深知在当前顺势而起的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似乎要冲淡一切人文价值和美好理想的时候，努力高扬人文精神和坚持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因而主张殚思竭虑，各抒己见，不拘一格，实事求是。也许正是从孔说老学的一句真言辨析里，我们可发现瑕不掩瑜的东方巨子的睿智灵光；也许正是从领袖先哲一生奋斗的坎坷足迹上，我们可领悟那知难而进的民族精英愈挫愈奋的坚韧意志；也许正是从中外大众文艺形象系列的审美观照里，我们可感觉中华民族那积蓄千年而终于乘势腾飞的伟力之源！

立足中国大地，呼唤真知灼见，传播先进文化，高张理想旗帜。

这就是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同仁精心策划，与有志者携手推出这套中国新文化传播书系的目的。

2002年2月23日

目 录

(上)

我与历史科学（代序）	1
孙中山思想在 21 世纪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4
试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38
试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与 作用	55
光辉的历程 奋进的足迹	67
划时代的伟大历史转折	71
准确把握近代社会思潮的特点	80
戊戌维新百年祭	82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85
近代岭南社会思潮概论	97
关于岭南文化的几点思考	166
岭南文化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173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面向现代化	180
近代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182

弘扬爱国主义是我们的崇高职责	191
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195
让爱国主义精神更加昂扬	200
枷锁与觉醒	
——从《马关条约》签订百周年谈起	203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	206
香港回归：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217
孙中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先驱	221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252
孙中山与捍卫共和国的斗争	288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310
孙中山的文化取向与“理想国”	327
关于孙中山与社会主义的几点浅见	347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	352
孙中山论“两个文明”建设	362
五四运动与孙中山	367
孙中山与儒学	371
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	386
孙中山与宋庆龄	406
论宋庆龄的爱国主义	428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宋庆龄的爱国主义	440
宋庆龄对儒教的批判	449
论朱执信的民主革命思想	463

我与历史科学（代序）

一、我为什么选择史学研究作为终生事业

我十分赞同和经常援引恩格斯在评论托·卜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时所作的申明：“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蒙：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

这是我从事学习和研究历史——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以来，逾40余年岁月而不渝的信念。

这种对专业的抉择和热爱，并非偶然。一方面，显然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父亲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报业史等课程。姐姐则酷爱文史，涉猎范围广阔。令我从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不少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旧制度的本质的犀利剖析，使我的稚嫩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不仅引发了我读史的热望，也启示我立志掀翻那血腥的“人肉宴席”。对我而言，学习和研究历史一开始就是与揭露和消灭“吃人”的制度密切相关的。以迄今日，我的这种初衷并未改变。另一方面，数理化课程的荒疏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的中学时代正值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生活中充满着激情、战斗和憧憬。而在1948年春于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民青”后，更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夏天，反动统治者进行了垂死的挣扎。白色恐怖使我在进入北京育英中学高一班后不足一月，便被迫暂时避往天津，旋于年底按组织指示潜赴解放区，在河北省泊头镇学习待命。翌年初，我随人民解放军重返津门并在市军管会参与接管工作。稍后，组织在干部“南下”的大潮中安排我复学，因为我时年仅16岁，即将大规模开展的祖国建设事业，显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接受了组织的建议，决心重新返校学习。由于对数理化课程的搁置，我别无考虑地选取了历史专业——虽然，对未来的经济建设心向往之：梦想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奔波在江河山陵之间。

1950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先是本科学生；后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尽管运动频繁，但在北大的学习终究是极为难得的。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我从史学的学徒起步，逐渐入门，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时光流逝，匆匆已过了40年。但已逝的翦伯赞、向达、杨人梗、齐思和、邵循正诸师音容宛在，风范长存。健在的周一良、邓广铭、张芝联等先生依然奋战于史学战线，继续给我以教诲和激励。特别是导师邵循正教授的严谨学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自己仅从诸师的道德文章中学得十之一二，确是愧对师门。

1958年秋，我毕业即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所长是杜国庠同志，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我的楷模。我在所内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虽有干扰和冲击，总算不绝如缕，并在前辈学者和同事的指导促进下得以初窥堂奥。在回溯30余年的研究工作历程时，我必须提到中山大学的陈锡祺教授，他对我的长期谆谆教诲，使我这个私淑弟子受益匪浅。

忆昔 20 初度，今已年过花甲，返顾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不禁惭疚，虽然这种状况有其客观原因——在十年内乱及此前的年代中，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泰半为各种“运动”所消耗；而社会科学的春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到来后，却又忙于事务。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时至今日，我常常咀嚼着那个讽喻意味深长的譬例：过去牙齿很好，但没有花生米；现在花生米有了，牙齿却差不多掉光了。这不正是我和同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实质所在吗？思之令人痛楚！

值得告慰于师友和社会的是：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它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无论历史科学的遭际如何，我始终确认它在社会文明中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我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仍将选择这门学科作为终身的事业。

二、读史使人明智

毫无疑问，历史科学承担着重任。

许多哲人曾经就此作过论述。培根的阐释十分中肯：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科学的终极任务，主要在于从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其本质和不同领域、层次的客观规律，使人们得以了然于过去，从而更为自觉地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这种主观能动性并非随心所欲，只有立足和凭借于客观的条件和因素，人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演出各式各样的戏剧。因之，历史的创造者就必须力求避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以便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效能，并使社会发展较为顺畅和健康。而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正是赋予人们活动以理性的主要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愈益深刻全面。历史科学的“通鉴”作用，自是越发增大。

特别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得史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令其摆脱了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主义的局限，无愧为进步人类变革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试以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例，它的科研成果所揭示的规律，无可置辩地表明了严峻的真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无论是农民战争，还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抑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不能够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拯救和发展中国，使之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只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经过反思和比较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才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并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上升到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能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梯。历史证明：惟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和发展中国。

其次，历史科学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甚至成为它的主要载体。显而易见，历史科学的这个职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健康发育的民族，都不可能抛却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虚无主义是有害的偏见，“全盘西化”的侈谈则无异于痴人说梦，以致它的主要倡导者胡适后来也不得不加以修改，用“充分世界化”的观念取代。然而，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有赖于对它进行科学的理解、辨识和取舍，使之具有时代精神和新的内涵。在这种意义上，全盘肯定同样是有害的偏见。历史科学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它的认识功能是广泛的：既综观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又横览了社会生活的断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阐明了事件和人物的本质，确认了它们存在的依据和作用，从而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辨识和取舍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此外，历史科学还是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主要手段之

一。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能容忍外来的侵袭和内在的压榨，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绵延不绝。这个伟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不仅善于悲叹自己的命运，并且决心改变屈辱惨淡的处境。长期以来，积淀深厚的崇高精神准则和价值取向，附丽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现为杰出人物的思想与实践。经由史学（它的各种形式的著述）的传播，后人得以认识、理解、继承与发扬光辉的传统，不仅在思想上予以认同，并在情感上蒙受感化。不言而喻，熟知此伏彼起的、波澜壮阔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史迹，读过《正气歌》、林觉民等烈士的遗书、孙中山的演说、鲁迅的杂文……必然丰富了人们的内心世界，提高了民族的综合素质。至于当代众多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对人们更为切近，发人深省，令人奋起。

以上所陈，只是荦荦大端。历史科学的作用和意义，当然远不止此。随着史学研究的改革，它的多元的社会功能必将强化和发展。

三、我对史学改革作如是观

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时代。社会主义必须在自我完善中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研究也要不断地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潮流，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历史教育”被人们所重视，即是从一个方面充分表明历史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不可代替的地位。

史学研究的改革，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史学理论、方法论到具体形式，无不涵盖。但是，中心课题还是理论、方法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学风与文风，因为这个课题关乎历史科学的存废兴衰。其余问题当然也很重要，却不具有本质的意义。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堪称历史科学的灵魂。史料的收集、

整理和审查，史实的辨识、考订和确认，自然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依据，因为论断只能产生于研究过程的终端。把握了准确的、典型的史实，才能引出科学的结论。但是，历史科学决非局限于史料的排比和史实的判明，它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规律性，这就要求揭示现象的本质和必然联系。因之，理论、方法论不可或缺。当研究过程进入分析论述阶段，既有赖于世界观的理论指导，又离不开方法论的实际运用，简单的初级逻辑思维在这里显得无济于事。标榜摒弃任何理论指导和崇奉“历史客观主义”的史学家，往往沦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俘虏。对于历史科学说来，理性是绝对必需和不可须臾背离的。

在史学研究的改革中，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原则。史学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在于它拥有科学的理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迄今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指南和科学手段。它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指出了群众、阶级、政党的相互作用，判明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因而，对历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方法论，正是我们的历史科学的优势所在。当然，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摒除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这种态度和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所以，它也戕害了历史科学。惟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它科学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必须充分吸取先前的和当代的一切科学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和丰富，永葆其生命力和活力。至于它的某些具体论断，或是已经不适合新的实际，或是在当时已不尽然，则应加以补充和更替。坚持和发展，乃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惟一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

信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拒斥古今中外其他具有科学成分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这里，主要侧重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而言。对西方的历史哲学一味膜拜是盲目性的表现，因为引进过程中缺少分辨。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否定，同样是缺乏分析的非科学态度。高墙深壑，拒斥一切，有悖于改革、开放的准则，只会使自己的思想封闭和僵化。事实上，当代科学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具有科学成分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值得吸收和借鉴，尽管其中包含着杂质和水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当是有所分析和选择的“拿来主义”，只要这种理论、方法论裨益于历史研究。况且，日趋复杂和多变的世界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理论、方法论的更新和多元化，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为了有助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和反映历史，必须不拘一格，吸取具有科学因素的理论、方法论的优长，为我所用。史学从封闭僵化走向改革开放，着重体现在理论、方法论的发展。近年来的一些史学著作就是实例，它们由于采取了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诸多视角和比较、计量等各种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丰富而新颖，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使过去一度盛行的某些干瘪枯燥的论著，大为减色。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史学家们应用理论、方法论的灵活态度堪资借鉴。他们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理论、方法论。甚至同一研究对象，也不排斥采用相异的理论、方法论，研究历史进程时，他们中的不少人较为侧重社会经济状况。探索个人的思想与实践时，则更多地乞助于心理分析。事实上，西方的哲学不断分化、翻新和变易，一种理论、方法论的流行时间往往很短，就为另一种“新思潮”所取代。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曾与许多外国史学家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其时，“新三论”已经更替了“老三论”，结构主义不再时髦，有不少学者服膺于新结构主义。他们对于一些概念的涵义的理解，也是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如有关“异化”——一度在我国理论界成为热点——的诠释就有 200 余种。这种状况不足为训，但在丰富史学著作的内涵和形式方面有着积极意义。我们对于理论、方法论的认同应当更为广阔，允许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化。以一元为主，又辅以多元，只会使史学理论、方法论有所发展，从而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对于史学工作者说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改革的进程不能中止。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必须彻底清除，沿袭已久的陈腐观念应当继续打破。但是，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不可背反，更不能允许有悖于科学。挣脱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的桎梏，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此而已，别无其他。不加分析地标榜“反迷信”，笼统地要求“总体反思”，甚至主张“彻底抛弃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以致把教条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因之，在反对僵化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同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关，也就一笔抹煞了建国以来历史研究的重大成绩。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理论、方法论的正确与否，决不在于时序意义上的“新”与“旧”，而取决于它的科学性，并需由实践加以检验，刻意求“新”地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可能产生暂时的轰动效应，却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正确的理论、方法论也决不会因其“旧”，以致变成谬误。应当指出，科学的理论、方法论的把握及其运用决非易事，来不得半点轻佻。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不是生搬硬套，囫圇吞枣——一切有益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这种过程难以一蹴而就，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对众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加以分析、辨识和选择，并发扬严谨朴实的学风和文风。史学研究的革新的关键，就在于此。当然，还包括选题、体裁诸问题。

应当力戒赶时髦，逐热点，生吞活剥“新思潮”，滥造乱用

怪名词，故作妄语以示高深，营造“体系”以显博大，热衷于“翻案”文章，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这些表现都是不足取的，因为这不是严肃认真的探索，与史学研究的革新无关，毋须赘言。甚至一些拓展性的尝试，也因缺乏科学性走入误区，前数年曾一度为人瞩目的“三论史学”、“新三论史学”，就是可悲的例证。

把自然科学的某些新理论、方法论引入社会科学，反映了两大科学体系的趋同，丰富和改进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种引进只能是有限度的、符合社会科学特点的，否则，必然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各有自身的规律和特色。历史科学以人类社会运动过程为研究对象，探索它的变化发展的规律。系统论、控制论却是从系统的“稳定性”出发，研究系统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二者之间的差异（研究对象、目的和条件）绝对不能忽视，生硬地搬用系统论、控制论去研究历史，不仅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深层之谜”，还会陷入窘困的境地。况且控制论乃至系统论在近半个世纪中虽然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但在理论上尚未成熟。它们不断向毗邻科学延伸和拓展，而来不及系统化、完善化。加以在阐发原理和方法的过程中，又受到了西方哲学流派的消极影响。可见，它们自身的特性及其不成熟性限制了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和效能，以致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论及这门科学与社会科学时也不得不指出：“有许多东西我们只好让熟练的历史学家用不科学的、叙述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制约下，自然科学的某些成果——理论、方法论，才能得以富有成效地用于一定范围内的课题。“三论史学”、“新三论史学”把自然科学理论、方法论的引进普遍化、绝对化，甚至以之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决非新史学的发展趋势的健康体现，留下的教训值得反思。谓予不信，试看近年来

的一些著作，如轰动效应不小的《兴盛与危机》等，当可了然。

四、我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

历史科学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自不待言。对于切近当世的中国近代史说来更是如此。这门学科的直接社会功能和强烈现实意义，使得关于它的研究工作的改革益发迫切。我之所以不揣简陋地阐明几点思考，并且兼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个重大基本问题作为验证，用心之处，正在于此。

近十余年，确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期。成果丰硕，诸家并陈。几乎在所有重大课题上都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当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不足和缺陷，并努力加以改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同这个历史时期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相比，与现实生活的需求相较，无疑存在着差距。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客观实际的观点和不足取的倾向，也是毋庸讳言的。应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

恰如其分地评价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研究工作，是关乎学科现状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如此，是由于这种估计涉及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去实绩、现有水平、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发展趋向。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力避片面性和绝对化。笼统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都非精当的论断。对于先前的许多研究成果，不宜轻率地否定，判为“极左思潮”的产品，当做有待“彻底破除”的“旧物”。甚至妄加罪状，如指责“两半论”（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观点的简称）“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成为“时至今日反对‘封建残余’仍然是严重而艰巨的斗争任务的思想认识